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构建

方长安

摘要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是以百余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实、传播接受相关话语为依据,对新诗传播接受特征、运行规律、诗学功能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诗学,其理论体系由概念谱系、理论空间、核心观念与认识功能所构成。“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作为母概念,由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四大基点性本源概念组成,它们决定了该诗学体系的基本属性;理论空间包括百余年新诗传播接受观念谱系、传播接受的诗性特征、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关系论、传播接受与新诗形象生成论,以及传播接受与新诗价值论;诗学体系的核心是传播接受机制。该诗学具有四大理论功能:一是揭示新诗创作演变规律,二是彰显新诗理论生成特征,三是敞开新诗形象塑造过程,四是提供估衡新诗价值的尺度。构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应处理好历史诗学与进行时态诗学、历史沉淀与未来发展、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传媒特性与诗性创造以及理论思辨与新诗实践等关系。

关键词 诗学体系;诗学理论;传播接受诗学;诗歌价值论;中国新诗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5-0097-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86)

中国新诗已有百余年历史,其创作发展、诗性生成以及历史形象等,都与传播接受有着直接的关系,传播与接受历史过程作为巨大的时空结构,为新诗生成、发展提供富有活力的存在场。传媒、接受主体有意无意间参与新诗的创生与形象塑造,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与特征,也是百余年中国诗歌诗性生成、诗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景象。换言之,一百余年来,随着现代传媒发展、文化语境变化,新诗史上生成出一种全新的诗学历史形态,即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诗学历史现象,长期以来的新诗研究、诗学研究虽然涉及这一历史现象,也有一些相关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尚缺乏将传播接受现象上升到诗学理论建构层面的研究,自觉构建体系化的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已经成为新诗研究亟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是对过去一百余年来生成、发展的传播接受历史诗学现象的发掘与总结,大体而言,其体系由三大维度构成:一是一百余年来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的特征、规律与功能等,涉及内容包括新诗如何被传播接受、传播与接受之间的关系、传播接受机制、新诗创作与传播接受的互动关系、传播接受与新诗理论创造以及历史形象建构等。它属于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二是百余年来诗人、诗论者关于新诗传播与接受的观念与理论,关涉为何写诗、为谁写诗、诗何为等重要问题,直指新诗本质,其展开史就是新诗传播接受理论史,属于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的历史知识范畴。三是基于百余年新诗传播接受历史特征的研究,以传播接受为视野而重建审视新诗历史、估衡新诗价值的标准,它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理论,其认识功能与实践价值的重要体现。这三大维度,涵盖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的内涵与外延,融通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

本文将以传播接受史实为依据,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坚持历史与诗学、理论与方法、共性与个性、事

实与思辨相结合的原则,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框架、认识功能与构建原则等。

一、概念谱系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特定的概念,以彰显本质属性,那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具有怎样的概念谱系?这是该体系构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大体而言,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概念谱系,由母概念和子概念构成。母概念就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以限定自身的理论范畴与内容。它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四个基点性本源概念,构成该诗学体系的基本板块,限定了其理论属性。“中国”,一方面规约了该诗学的国别范围,明确了研究对象是中国的诗歌理论问题,暗示了研究背景是整个世界,将该诗学限定为世界现代化进程里的中国诗学;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国身份与文化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该诗学与民族文化建设相关,具有重要的中国文化价值属性。“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限定了研究内容属于新世界、新文化范畴,具体而言即新兴的诗歌,论说背景是整个旧诗,通过旧诗这一参照物,揭示新兴白话自由诗歌的特征是其重要诉求,在新旧对话的现代语境里,“新”又具有“现代性”品格。“传播接受”,由“传播”与“接受”两个概念合成,“传播”乃传扬广播之意,就是以特定形式传递信息,旨在使信息被传播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所接纳,产生有益于传播主体的反应,使传播者的价值观获得更为广泛的意义;“接受”就是知识信息的吸纳与反应,是受体行为,但反应则使接受者身份发生变化,成为表达主体。“传播”与“接受”构成信息处理的两端,属于不可分割的两极,所以笔者将其合并为一个概念。传播接受属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文化等各种复杂关系之间的通道,或者说是复杂的人类世界存在的重要条件与体现;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有传播不一定有接受,没有接受的行为就不能称之为传播接受。例如,胡适《尝试集》的出版发行是为了传播,但出版后是不是形成了传播接受的完整过程,这是一个需要考察的历史问题,它一版再版表明其出版后进入销售渠道,被读者阅读购买,具有突出的阅读效果,也就是被相当多的读者所接受,这个过程就是完整的传播接受过程。换言之,“传播接受”是由两个独立的基点性概念组合而成,必须二者相生共存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接受链。“诗学”,昭示了“学”的具体类别与特性,即关于诗歌的理论。四大基点性本源概念,它们各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组合到一起形成新的关系语义,整合成为新的诗学结构体,生成出新的语义。我们考察、研究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必须注意其各自的语义,尤其是其组合机制、特征,但最终指向是揭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语义奥秘,尤其是其在诗歌创作史、传播接受实践中的对象化情形与特征。

但如果以“诗学”为中心概念切入问题,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诗学,则是“诗学”这一核心范畴被不断限定的结果,即由“诗学”到“传播接受诗学”,到“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再到“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它们构成该诗学的又一系列性概念。要认知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就必须对这些以“诗学”为中心的具体概念有清晰的理解,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揭示它们组合的内在机制与特征。“诗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狭义是关于诗歌的言论话语,是探讨诗歌创作、欣赏与批评特征的理论^{[1](P1-15)}。本文所使用的诗学概念,主要是狭义范畴的。“传播接受诗学”,则是关于传播接受现象与问题的理论,研究内容是传播接受主体、传播接受内容、传播接受客体、传播语境、传播通道等,旨在揭示传播接受的特征、规律与功能,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诗学范畴。传播与接受有多复杂,传播接受诗学就有多丰富。“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研究的则是新诗之传播接受内容、传播接受方式与特征等,以深化对新诗创作史、形象建构史的认识,它不同于既有的狭义和广义的诗学,或者说接通了狭义诗学与广义诗学;“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则是关于中国时空中发生的新诗的传播接受特征、规律的学说,是一门具体而繁复的诗学理论,即引入传播接受观念,从传播接受维度,论述中国一百余年来新诗创作、诗性生成与传播接受的复杂关系,揭示新诗与现代传播关系的诗歌理论。

作为诗学范畴,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由一系列子概念组合而成。每个子概念的内涵、外延不同,具有自己独立的话语谱系,而其话语谱系则又是由众多的二级子概念构成,诸如“语境”“大众读者”“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精英读者”“传播者”“传播通道”“传播方式”“阅读机制”“接受反应”“阅读反馈”“读者期待”“期待视野”“阅读体验”“审美创造”等,每个二级子概念也可能具有自己的三级子概念,由此构成一个繁复的概念谱系。

历史地看,由于一百余年来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新诗人的文化观念、情感生活迥异于传统诗人,尤其是传播媒介的现代化,导致中国诗学既有的那些概念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表达力,传统诗学体系里的术语,诸如诗教、顿悟、静穆、体物、声律、对偶、用典、象外、温柔敦厚、气韵、中和、兴、观、群、怨、宗经等,不再是言说诗歌的核心术语,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诗学概念,诸如象征、悖论、隐喻、朦胧、反讽、陌生化、想象、直觉、散文美、戏剧化、通感、及物、情绪、灵感、纯诗、崇高,等等。一百余年来人们言说新诗的理论概念,看起来相当独立,许多还是从域外引进的,但从内涵与外延看,它们与现代传播接受语境、传播接受特征分不开,新诗的传播诉求、读者阅读反应决定了这些概念的发生或引进,决定了其内涵与外延的传播接受性,所以它们属于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中的概念。亦需留意的是,旧概念的发掘与传承,新概念在使用时与中国创作的融合问题,都是非常复杂而亟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之,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具有完全不同于古典诗学的概念谱系,它们具有现代传播接受性,共同彰显了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化程度与现代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为系统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应建构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该框架既应能容纳新诗相关历史知识与理论话语,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论说空间,以有效叙述、阐释新诗传播接受理论问题,重审既有的新诗创作史和形象建构史,为科学地评说新诗成就与问题建立新的理论范式。即是说,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框架,既要能容纳该诗学固有的知识与理论,又必须是一个为言说者提供立足当下以言说传播接受与新诗未来发展的时空结构。具体言之,该理论框架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装置结构或者说理论空间。

一是百余年新诗传播接受观念谱系空间,它装置的是百余年来诗人和理论思考者的传播接受观念、传播接受观念史或曰话语史。传播接受观的关键问题是诗人创作与读者的关系,核心是诗人的读者观。不同于古代,现代以降的新诗读者属于文化启蒙、社会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读者,诗人与读者的关系涉及的是新诗写作的社会文化目的,而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抒怀,其中包括个人性与社会性、私人性与公共性、历史与现实、诗性创造与文化价值等诸多一体两面的问题,所以诗人的读者观作为传播接受观的核心,是理解百余年新诗创作史的关键,而读者意识的嬗变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新诗发展史。传播接受观念谱系,是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的基石。

二是中国新诗百余年传播接受特征空间。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是新诗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份属性是传播与接受,所以传播接受特征是该专门性诗学体系最重要的内容,牵涉的问题域包括:新诗的传播特征,接受特征,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传播接受语境,传播接受的载体、通道与方式,传播接受机制,传播接受的私人性、审美性与社会性,真实性与虚假性,创造性与破坏性,中国性与世界性,现代意义建构性,等等。该诗学的基本理论是围绕传播与接受展开的,传播接受又是在百余年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展开的,所以这个理论体系离不开百余年诗歌实践、文化实践以及社会革命实践,是历史动态发展中所探索创造出的理论,梳理、归纳与总结新诗传播接受特征,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将理论建构史与历史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这是建构这一理论框架应注意的问题。

三是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发展、诗学建构的关系空间。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的“诗学”是一种狭义性诗学,即关于诗的理论,诗是该理论的言说范畴与目的,所以所有关于传播接受特征的论述不能离

开诗,而在新诗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新诗创作与新诗自身理论探索。于是,传播接受作为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化传播空间与创造空间,作为一种现代性行为,是如何作用于新诗的创作实践,如何影响诗人们的诗创作,如何推进新诗创作史的发展,如何推动诗人及其他理论工作者思考、探索新诗创作理论问题,等等,就成为该诗学理论体系最具实践价值的内容,是其创造活力的体现。该框架内容为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提供理论质感与活力。

四是传播接受与新诗历史形象建构空间。新诗是一种新的诗歌形态,是从无到有的实践产物,其形象不是生来俱有的,而是建构出来的。诗人的创作建构,即诗歌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新诗形象,相当程度上属于新诗本相;但是,这个所谓的本相不是客观呈现给世界与读者的,而是通过传播而接受的“本相”,是传播者讲述出来的“本相”,也是接受者根据传播者提供的信息想象创造出的“本相”,所以并非真正的客观“本相”。换言之,传播接受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创造了新诗历史形象,该框架结构需要容纳的就是传播接受建构新诗形象的历史内容以及相关理论话语。

五是传播接受与新诗历史体系及价值系统空间。百余年新诗史是在传播接受中建构出来的,百余年新诗的价值评估也是在传播接受中完成的,二者之间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即传播接受“生产”出新诗历史与价值体系。这个“生产”不是物质生产,而是精神产品的创造,是人的实践行为的结果,一种主观创造活动,所以需要重审再估。该理论框架就是要从传播接受维度重建新诗历史体系、重构新诗价值谱系提供言说与表达空间。

该诗学理论的核心是传播接受,关键范畴是中国新诗,就是说它要创建的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播接受诗学,也不是外国诗歌的传播接受诗学,而是中国新诗的传播接受诗学,所以,必须认真考虑“中国新诗”的生存时空,时间是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余年,且向未来无限延展,空间是中国,在这样具体的时空中,研究中国新诗生成、发展与传播接受的关系。该诗学内容不是超越时空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诗歌问题探索,所要建立的不是抽象的诗学谱系,而是旨在揭示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现代性、中国性关系的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框架,不是基于主观臆想,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总结与理论探索,构建的依据是历史事实,历史文献是钩沉、建构的基础,是理论框架的基石。那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历史文献主要有哪些类型,存留现状如何?大体而言,主要有新诗书信、新诗广告、新诗评论、新诗序跋、新诗集、新诗史著作、新诗教材、新诗论集、新诗人年谱、新诗编年史,等等。其中,少数已经汇集成册^①,更多的则留存于一百余年来各类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其他载体。构建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就必须全面搜集、整理这些历史文献,它决定了所建构的诗学的根基厚度,决定了诗学理论框架与体系的坚实性与可靠性。

那如何搜集、整理历史文献?一百余年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献,可以采取分时期搜集、整理文献的思路与方法,这样整理出来的文献将为梳理百余年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嬗变史提供有力的支撑。历史文献散见于不同的载体,可以采取拉网式方式,尽可能竭泽而渔;文献浩如烟海,需要分类整理、保存;文献存在着真伪问题,需要校勘;文献存在着理论价值大小之别,需要以“传播接受性”为尺度,划分等级,分等级管理。

理论框架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是理论言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在历史文献爬梳中,归纳诗学内容,寻找言说逻辑,以构建诗学体系;以理论框架装置历史事实,分层次管理历史事实,以理论烛照历史空间,发掘文献的诗学价值。诗学与文献之间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烛照与发现的关系。

^① 如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理论建设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1918-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谢冕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等。

三、体系核心

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的核心,是传播接受机制。应该从哪些方面考察、研究这一核心?笔者以为必须研究新诗的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接受时空、传播接受通道、传播接受方式以及传播接受成效等,立足事实,分析它们各自的基本内容、特征与功能,研究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分析关系发生的时空、目的,论述关系的运行模式及其与诗创造的联系性等,由此揭示新诗传播接受复杂的机制。

传播者、接受者是传播接受时空现场重要的历史主体,他们的阶层身份、诗学气质、文化品格与价值认同等深刻地影响着传播接受特征的形成。作为历史过程中具体的存在者,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与言说者,他们既是具体的个人,但其独特的“这一个”性格又不是任何一位个人所能涵盖的。历史时空中任何一位行为者,在一种关系里可能是传播者,在另一种关系里则可能是接受者;他们可能是诗人,是诗歌理论探索者,也可能是大众读者;可能是积极的传播者、接受者,也可能是被动的参与者,对传播接受意义缺乏明确的认知。例如,胡适、刘半农、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胡风、艾青、郑敏等,他们都是个体诗人,是诗歌文本的创作者,也都是新诗理论的思考者、言说者,都曾积极地传达新诗理念;他们也曾是观看者、聆听者,是新诗传播接受时空中的传播者、接受者。他们是具有行为力量的主体,是故事的参与者,也是意义的创造者,所以传播者、接受者是该诗学体系中的灵魂,构成该诗学得以发生、存在的前提。他们的知识构造、行为意愿、诗歌趣味与目的诉求等,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具体的新诗传播接受事件的形态、价值与意义,决定了传播接受的特征。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无以数计的大众传播者、接受者,他们是启蒙的对象、革命发动的对象,诗人们希望他们阅读作品后受到感动,获得某种新的现代观念或思想,成为新的行为主体(并不是成为诗歌领域的成员);从身份上看,他们首先是新诗的接受者,继而才是新诗的传播者,也就是作为读者的传播者,他们不仅为新诗开辟新的传播接受空间,而且拓展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空间。

何谓传播接受时空?新诗的传播接受时空,也可称之为传播接受语境,其最大的特征是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不是完型形态,其形貌、结构与本质都处于生长之中,成长性、新异性、挑战性等是其重要特征。这一传播接受时空,早期主要存在于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汉口这种新兴城市。这些城市在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就出现了新兴产业工人,出现现代生活的初级形态,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交流形式,这是早期新诗发生、生长所置身的外在传播接受空间;与之相比,更广大的中国社会尚处于非现代境遇,未能形成现代文化传播空间。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不能绝对地说城市里有可见的传播接受时空,更广大的乡村里没有。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新诗传播接受时空,更准确的表述是语境,即言语之境,就是现代知识人通过报纸杂志等所创造的传播接受空间,主要是由《新青年》《新潮》《创造周报》《东方杂志》《新月》《北新周刊》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解放日报》等共同创造出的具有现代气象的文化知识空间、思想空间。这个空间里传播的要么是翻译的外国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现代性作品,要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写作的具有新质的作品。译作与中国作品之间构成互动关系,生成新的现代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某种程度上讲,是纸上存在的空间,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参与者、阅读者及其感兴趣者才能感觉到其存在。现实中的传播接受空间与纸上这一空间,在大城市有交流、交集,但在更广大的乡村、小镇,这两个空间几乎都不存在。这种语境出现于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内容、形态与特征有很大的变化。它经历了启蒙、革命、战争等性质的变化,这就是现代新诗传播接受得以展开的空间状态。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冷战,构成言说的国际语境;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构成当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时空。新诗的传播接受特征与传播接受的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关系,新诗之诗性与非诗性的博弈就存在于不断变化的传播接受历史语境之中。

新诗的传播接受通道,存在于这一时空之中。通道是空间中的通道,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则看不

见、摸不着,它通常借助于某种媒介得以实现,诸如书籍、唱片、无线电、教室、电话、胶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不同的媒介展现出不同的传播接受方式。一本诗集出版后,有一个发行与购买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传播通道,它借助于具体媒介完成;关于一首诗作或一本新诗集的批评、通讯、广告,属于阅读接受后的再传播,这种再传播将进一步拓展它们的接受空间,这同样是一种传播接受通道,这个通道里的广告、通讯、批评属于不同形式的传播接受方式;一首新诗作品被读者阅读后删改,并再次推向读者,该事件亦是一种传播接受通道;教师在讲台上谈论、讲解新诗,学生接受教师的讲解,构成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接受形式与通道;街头粘贴诗,广场上朗诵诗,也是借助街头、广场这种特殊媒介而形成的一种传播接受通道;一个文本里引用某位新诗人的作品,是一种以文本为载体的通道;朋友间茶余饭后关于新诗的评头品足,同样是一种传播接受通道和传播接受方式。通道之间可能有交叉,也可能没有任何交集,形形色色。通道中有传播者,也有接受者,他们之间的交流形式,就是传播接受的方式。通道依存于媒介,是空间中的存在物,也是时间中的存在,时空变化构成历史的过程,不同历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通道与交流形式,即便是相同的通道在不同的时空里其内容、特征也不同。形形色色的传播接受通道与传播接受方式,与传播接受媒介融为一体,具体媒介的面貌、特征使通道和传播接受方式各具相应的个性,进而赋予被传播的新诗以不同的力量与质素,影响着其意义的生成与增值。这就涉及传播接受的成效问题。

成效指的是作品被传播接受的广度与深度,主要表现为作品对他人诗歌创作、诗学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对他人的人格变化的影响。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等不断再版,就是传播接受高成效的体现;出版、再版是传播接受通道的延伸,是在原来传播接受基础上的进一步传播;它们被其他诗人参考、借鉴,又是更进一步的传播接受;它们影响到读者的成长、文化的发展,又是更深入的意义上的传播接受。这种成效,是在传播接受通道里完成的,也意味着传播接受通道、传播接受方式、传播接受空间的不断拓展。在诗的意义,成效更表现为诗学观念的创造、新的诗歌创作潮流的形成,体现在新的诗歌风格的培育、创造上,也就是借助于传播接受,新诗自身得到生长,诗性得到发展。传播接受的成效因为与传播接受有着直接的关系,必须深入地研究传播接受才可能对新诗的生长史、某种趋势变化史有更准确的把握。

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接受通道、传播接受方式、传播接受成效等,构成新诗传播接受的基本维度,决定了传播接受外在结构形态与内在意蕴空间,它们之间形成完整的意义生产关系。它们之间的组合原理和生产关系就是新诗传播接受的机制,所以研究新诗传播接受机制,不仅要弄清楚各个具体要素的内涵、外延,更应揭示它们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的,揭示关系建构的生活基础,研究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新诗传播接受的运行方式。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返回历史现场,从具体传播接受事件中提炼出关系特征与运行方式,从传播接受成效反向推出哪些传播接受关系与运作方式是科学的,哪些是不利于新诗发展的,研究它们为所传播接受的新诗赋予了怎样的能与形。

四、洞察新诗创作及其理论的认识功能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既是客观的历史诗学,又是科学的理性诗学,具有洞察新诗创作演变特征、把握新诗理论创生规律的功能。

新诗创作思潮是如何发展的,具有怎样的特征与规律,一直是新诗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从读者传播接受维度敞开了被其他研究理论与方法所遮蔽的特征与规律。主体意识决定着人的外在实践行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认为,诗人的传播接受观作为一种观念结构,相当程度地左右着其诗歌创作探索与风格,影响整个诗坛创作潮流。诗人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创作的文本是为了给读者看。诗人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对特别重要的关系。传播接受观,简言之,就是关于诗人、文本与读者关系的观念,其延伸内容是诗人、文本与社会的关系。读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集合性群体,从不同角度

可以作不同的分类,诸如业余读者与专业读者、大众读者与精英读者、校园读者与社会读者、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等。读者是作者之外的阅读者。但作者自己亦是阅读者,也可以谓之读者。诗人如何处理自己与读者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传播接受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如何理解创作与自己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与民族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传播接受观的重要维度;这些外在关系将直接影响着诗人如何处理诗歌创作的内部问题,诸如取材、形式、语言、节奏以及审美价值取向等;所有这些都是新诗传播接受观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何具体介入这些问题?诗人的新诗论是最有效的切入口。诗人的新诗论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诸如题材论、创作形式论、诗潮论、风格论等,那其中哪些属于传播接受范畴?大体而言,有些是显在的具体的,一眼就可以发现;有些则是隐在的普泛化的,需要认真辨识。诗人直接论述自己是否重视读者阅读问题,诸如李金发就说过,“我作诗的时候,从没有预备怕人家难懂,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2](P250)。这就是李金发直接表达的读者观。又如朱光潜论述诗之晦涩问题时说:“我着重‘懂’字,用意是把问题从诗的本身移到诗与读者的关系上去。”“就诗与读者的关系说,诗的易懂程度随读者的资禀,训练,趣味等而有个别的差异。”^[3](P176)在他看来,读者是决定诗之显晦之关键。在新诗理论史上,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即诗人们表面上谈论的是诗歌内容、形式问题,实则指向阅读接受,属于普泛化的读者阅读接受论。新诗人之所以强调白话写作、口语写作、自由体写作,就是为了让更广大的文化程度低的读者能读懂,能接受诗中所表达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情感,起到文化传播、人的启蒙以及社会革命的效果。从梁启超时代就开始出现的诗歌通俗化思潮,一百多年来,一浪高过一浪;胡适倡导的诗体解放运动、口语诗潮以及以文为诗理念,不断普及推广,使散文化成为新诗最重要的潮流之一;从五四开始的大众化运动,到普罗诗歌运动,到解放区诗歌的民歌资源利用,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民歌写作,大众化贯穿新诗创作史;破除格律,强调诗歌写作顺其自然,认为新诗可以不押韵不讲平仄对仗,可以方言俚语入诗,反对欧化倾向,是诗歌内在形式探索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些广义上都属于新诗的传播接受观范畴,目的是为了将诗歌从圣神的殿堂里解放出来,使新诗便于阅读,为现代大众读者所接受。换言之,新诗理论的内容论、形式论几乎都是围绕普通大众读者阅读这一轴心而展开的。所以研究新诗人的读者观,既要考察其直接的读者论,也要发掘、研究隐藏于一般诗论文本中的读者观。

新诗人的传播接受观,从新诗发生那一天就开始了,贯通至今,且多散落于创作论、批评论、诗学话语之中,我们不仅要弄清其历史脉络、理论来源,弄清其内容构成和话语机制,而且还应该从传播接受维度,对新诗发生发展史进行重新考察、梳理,揭示新诗创作内在的多重秘密。换言之,新诗传播接受观,不仅接通了诗人与读者、社会的关系,而且连接着新诗诗性的创造,既是诗人论,又属于诗歌社会学,既是外部研究,又是进入内部探索的重要入口与特别通道。它最重要的价值是可以打通新诗内外部关系研究,为新诗内外部各种问题的探索提供更为切实的依据。

在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中,传播接受观影响着整个传播接受过程。传播接受过程作为一种读者阅读接受行为,最重要的功能体现在与诗创作的关系上。它不仅可以打通新诗内外部关系,构成外在时代语境与内在审美建构发生关系的客观依据与可能性路径,而且直接影响着诗创作的走向。大体而言,传播可能是对新写出的诗作的传播,也可能是对某个旧作的传播,尤其是对公认的重要诗作或经典诗作的传播。新作品的出版传播,其结果可能被读者无视或拒绝,也可能被欣赏、肯定,拒绝或肯定都会直接作用于诗人的当下创作,作用于诗创作倾向或潮流的走向;对旧作品的传播,是接受基础上的再传播,旨在进一步传播其精神与审美价值,扩大其影响,从创作角度看,这是对曾经的新诗创作思潮或者艺术探索的肯定,将推动当下诗歌写作接续某个诗歌写作传统。接受,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读者对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艺术性、价值观的认可,使之成为自己知识谱系、艺术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作用于某种新的创作思潮、审美风尚的形成;第二层次是指诗人在创作中接受作品的影响,借鉴、化入其精神与艺术经验,这是富有创造性的接受。

本诗学所讨论的传播接受是新诗的传播接受,它联系着新诗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新诗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的关系,具体言之,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读者的阅读接受意见,反馈到作者,给作者某种冲击、启示,影响其对自我诗学观、创作观的认识,进而巩固或调整某种艺术追求与观念,加速或减缓或放弃某种创作倾向。这是接受美学所置重的维度。五四时期,《学灯》杂志编辑宗白华阅读郭沫若诗作后,与之通讯,反馈阅读感受,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就属于这类接受^[4](P4)。二是某个普通读者阅读某个诗人诗作后,激起自己的创作激情而写作新诗。胡适、闻一多新诗创作的追随者,大都属于这类读者。三是作为诗人的读者,阅读了某个新诗作品后借鉴、活用诗作中的某种艺术经验,或者受其审美意识冲击,开启新的创作方向。徐志摩与泰戈尔、郭沫若与惠特曼、冯至与里尔克之间的关系,可作如是观。

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阐释传播接受与创作之间的内外在关系。既要梳理过去一百余年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的复杂关系,这是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与重释,需要以事实为基础,揭示不同层面的关系特征,从传播接受维度阐释百余年新诗创作演变史的内在动力机制,论述新诗情感空间、精神价值、审美形式生成的规律,对新诗艺术得失作出新的解释;又应该在具体现象研究基础上,进入理论思维空间,对新诗传播接受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各种子论题、组织构造、诗史关系等进行阐述,对其内在的理论张力进行探析,揭示它所具有的中国属性,为进一步构建中国新诗理论体系,提供新的生长点;不仅如此,还应该从中国新诗未来发展维度研究传播与创作的关系,以创作为目的诉求,以理论建设为支点,在融媒体时代,拓展中国新诗理论的开放空间,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接受对诗创作的影响,看起来属于外在动力范畴,属于影响新诗演变的辅助力量,但事实也许不是这样。新诗传播接受始终与新诗创作发展相伴随,与新诗合法性、诗学探索相伴生,迥异于20世纪以来读者对历史上的旧体诗词的阅读接受,后者并不影响历史上的旧体诗创作。就是说,新诗的传播接受是以创作发展为背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关系,读者可能就是作者,作者也可能是读者,于是传播接受的主体、受体往往无法分清,传播接受成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行为,创作成为传播接受的重要目的诉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不是一般力量场域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一些情形中属于同一主体内的对话关系,研究传播接受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应努力超越现象,进入主体内部,揭示它们之间盘根错节的精神脉络。

真正的诗人,都是特殊的个体,有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独特方式,他们各自的读者观、创作观存在很大的差异。真正的诗歌读者,也是追求个体感受、体验的主体,有自己特别的审美趣味与反应。这要求我们在论述传播接受与诗人创作关系,在处理共性特征的同时,要重视差异性。不仅如此,在传播接受与创作关系中,必然性是大趋势,它生产大的历史风景;但是,偶然事件也无处不在,而且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通往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既要注意传播接受与创作之间的必然性联系,也不能无视那些偶尔事件,它们也可能改变了既有的创作倾向。这些都是研究传播接受与创作之间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不仅能够有效解释新诗创作走向,还能洞悉传播接受与新诗理论建构的内在关系,揭示出传播接受如何推动新诗理论创生,使新诗理论形成相应的形态、特征与价值。

首先,新诗传播者、接受者的现代文化品格,规范着新诗理论建构。新诗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急先锋,发生、发展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现代性生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决定了作为传播者的诗人的文化品格与创作意图,决定了作为接受者的读者的精神诉求与阅读期待,创作意图和阅读期待的总体特征是反封建与传播现代文化,诗人写作不是为束之高阁,而是为启发读者,影响社会发展。于是,如何影响读者和社会,就成为诗人们考虑的重要问题,也就是一百余年来新诗理论探

讨的核心问题。现代大众读者的文化水平、思想状况决定了诗人们将新诗的通俗易懂性、白话口语化作为形式探讨的价值取向;传播现代文化观以启蒙读者,决定了如何以诗表现现代思想文化和诗歌应具有怎样的思想情感空间,成为诗人们探索新诗精神向度的重点。

其次,传播语境对新诗理论建构的影响。作为传播接受时空语境的百余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诉求,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新诗人因而思考、创造出不同的诗学理论。五四启蒙时期,传播与接受目的决定了那一时期的新诗理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工神圣、平民诗歌、国语诗歌、白话自由体诗歌方面,形成了以个人性与公共性、独语与对话相互缠绕为特征的一系列诗学理论话语;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中期是现代文化深入发展和革命文化建设时期,新诗理论探讨更多地集中在现代派诗歌创造、无产阶级诗歌创造等问题上,形成了现代派诗学、无产阶级诗学等理论话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降的战争语境,决定了如何以诗歌参与民族抗战、如何以诗歌参与革命战争成为新诗理论建设的重点,出现了街头诗、朗诵诗、民间形式、民族形式、现代化等诗学理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诗传播接受的时空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传播者、接受者身份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历史时期,新诗理论探讨的重点是新诗如何社会主义化,新诗如何在冷战语境中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以创造出新的诗歌,于是新诗的社会主义改造、新诗的现实主义命题、两结合创作问题、新诗民族化问题等成为理论思考与建设重点,出现了政治抒情诗理论、两结合理论、新诗民间化理论等;70年代末期以降的改革开放时期,重续新诗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重建新诗审美体系,参与世界诗歌对话,成为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朦胧诗歌理论、归来诗歌话语、第三代诗歌理论、后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等,各种旗号的诗歌话语,有名无名形形色色的诗学观念,构成这一时代众声喧哗的诗学谱系。

研究语境与诗学建构的关系,可以深化对新诗的认识。例如,语境的声音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语境是语言之境,声音是语境得以存在的前提,有什么样的声音就有什么特征的语境,一般而言,就会产生相应特征的诗歌。现代传播时空,相对于古代,是一个充满现代声音的时空,新诗生成出相对于古代诗歌更为丰富的话语内涵,这是其重要的魅力所在;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遗憾的是,新诗不同于古代诗歌,其诗与歌是分离的,即新诗重视的是文字性存在,不重视平仄、押韵,声的特征受到压制,这与现代传播语境丰富的声音特征相错位。宇文所安认为:“声音从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属于某个人,标志这个人的身份并印上他的特性。”^[5](P67)诗歌之诗味,与个性化的声音是分不开的,不重视声音的新诗的个性化审美艺术无疑大打折扣。新诗追求口语化、大众化,但无声文字的存在形式,使这种追求相当程度上落空了,这是新诗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现代一些诗人和专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郭沫若、闻一多、饶孟侃、戴望舒、林庚、叶公超、陆志韦等思考过新诗的声音问题^①;抗战爆发后,因表现抗战之声的需要,朗诵诗成为一种时代之诗,新诗的声音问题重新受到重视,涌现出一批论说诗歌朗诵问题的诗学文本^②;但可惜的是,当时论者主要是从宣传维度谈论诗歌朗诵效果,而少有从理论上探索新诗之诗与歌的关系问题,这是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亟须探索的诗学理论现象。

再次,传播接受媒介、方式对新诗理论建构的作用。传播接受媒介决定了新诗的传播接受方式,用于其理论探索。新诗的传播媒介主要有现代报纸杂志、各类学校讲台、街头广场、唱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如果说传统诗歌的传播囿于宫廷、歌楼、酒肆以及题壁、石刻等,传播范围不广,主要是在朋友

① 如郭沫若《论节奏》,《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10月5日;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5月13日;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22日;戴望舒《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1日;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林庚《诗的韵律》,《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5日;叶公超《音节与意义》,《大公报·文艺》,第129期、145期“诗特刊”,1936年4月17日、5月15日;陆志韦《论节奏》,《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37年7月1日。

② 如高歌《诗与声韵》,《中央日报》1935年7月12日;高一凌《谈新诗诵读的问题》,《中央日报》1937年2月6日;臧克家《诗歌朗诵运动展开在前方》,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8月30日;魏孟克《关于诗的朗诵》,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10日;郑林曦《谈诗歌的朗诵》,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7月1日;姚星《关于诗的朗诵》,《中央日报》1947年10月26日;高兰《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时与潮文艺》1945年2月15日。沈从文写了《谈朗诵诗》^[6](P250-252);朱自清写了《朗诵与诗》^[7](P388-395),等等。

或少数读书人阶层传播,那现代传播媒介则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广场性、大众化、陌生化等特征,这些特征势必影响着诗人、诗歌理论工作者的诗学思考,探索诗作在这些媒介传播的方式,探索媒介与诗意创造的关系,媒介与诗思、媒介与诗形、媒介与诗性共生的关系成为思考的重心。胡适主张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8](P79),满足的是现代报刊体、广播体、教学体的要求;闻一多的新格律诗主张,倡导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9],与现代传媒的音乐性、立体感、彩色空间不无关系;新诗戏剧化美学^[10],与现代剧场这一传播媒介相关,借助戏剧舞台传播现代诗歌;诗体解放诗学、自由诗形式美学^[11](P299),更适合现代白话报刊的传播;艾青等的散文美理念^[12],与报刊的散文体写作不无关系;媒介的社会性、公共性决定了懂与不懂的问题,成为一个共同的诗学理论话题,朦胧美成为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现代传媒的社会性特征,使得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主张,成为卞之琳等钟情的诗学。媒介的广场性、公共性、陌生化使得诗人创作时,势必考虑书写内容、情感必须有助于作者自我人格塑造,一些诗人难免在诗创作中进行人格表演,真实性成为现代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内容。即是说,新诗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方式特征,决定了新诗理论探索的重点与焦点,使之形成相应的理论形态与个性。总之,新诗传播接受的特征影响了新诗理论建构,使新诗理论形成相关的内容与特征,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将考察研究这些特征的形成机制,反思传播接受对理论建构的正负影响,以丰富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

五、评估新诗形象及其价值的功能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具有从传播接受维度,评估新诗形象的认识功能。新诗作为一种不同于旧诗的诗歌形态,其历史形象固然由新诗作品所勾勒与突显,一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诗作品塑造了新诗本相。然而,这个本相并不是作品的自然呈现,而是由读者阅读后讲述出来的。讲述是读者作为主体的一种话语行为,读者的观察姿态、讲述立场、价值观念、讲述目的等势必体现在其取舍与言说中。我们看到的“新诗”形象,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本相,而是读者心中、话语表达中所重构的形象。读者的讲述,就是一种传播,一种接受后的表达。换言之,传播接受塑造了“新诗”形象。

传播接受的形式、途径很多,每一种形式、途径都以自己的方式塑造着“新诗”形象。传播接受诗学理论论述了不同形式的传播接受塑造“新诗”形象的特征与机制,把握了其规律。一百余年来的生产力状况,尤其是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现代化程度,使新诗的传播媒介不断更新与现代化,报纸杂志、现代书籍、街头广场、新式学校、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不断置换旧的传播载体,扩大传媒空间;传播的主要形式有朗诵、广告、通信、读者批评、文学史著作、文学选本、课堂讲解、序跋等。传播者因媒介和传播形式的不同,其阶层身份亦不同,分属不同的人群,传播诉求各异,拟想的受众不同,受众的不同也使得其取舍不一样,所讲述的诗人、诗作的层次高低不一样。广播电视所讲述的是能够满足广播电视的大众化受众的诗作;学校教育所选取的势必是有助于审美趣味、人格培养的诗作;街头广场所传播的街头诗、朗诵诗必须具有朗诵性与感染性;文学史著作则是从历史的视野、学术的水准取舍作品,所论诗作必须具有史的价值。不同媒介选择与讲述不同的“新诗”,有的追求历史的完整性,突出史的演变构造,有的只是单个诗人、诗作鉴赏;有的置重审美属性,有的突出价值论,塑造出来的“新诗”形象存在很大的区别。即是说,媒介、传播形式及其所对应的不同接受者,影响着“新诗”形象的塑造,这是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从理论上探索、把握的重要内容。这种探索,旨在揭示“新诗”形象塑造的不同路径、特征与规律,为历史地、审美地认识新诗形象,提供支持。

新诗传播与“新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播接受与新诗经典化的关系。经典化是文学史、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界探讨比较多的问题。何谓经典化?简言之,就是将某个作品变为经典的历史过程,它既是理论命题,也属于历史研究范畴。变为经典的历史过程的执行主体是传播接受者,展开过程是传播接受过程。将一个诗人、诗作由寂寂无闻者变为经典的过程,就是该诗人、诗作的传播接受过程,经典化问题就是传播接受问题。

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从理论上辨析经典、经典化、新诗经典化、语境等几个关键概念的内涵外延,在辨析中与古代诗歌经典、经典化比较,与现代小说、戏剧等其他类型作品的经典化比较,以发掘其独特性。语境是传播接受与经典塑造共同置身的背景,是历史的上下文,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阐释语境问题。一百余年来,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语境变动不居,众声喧哗,处在不断生成变化之中,影响着行为主体的言行与审美判断,影响着主体对现代性、新诗观、经典性等的认识,这些是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阐释的题中之义。语境是言语之境,语与境相互依存,传媒是语境中的传媒,是传播信息话语的,它们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所遴选、塑造的经典具有意识形态性。百余年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林林总总,诸如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劳工神圣思想、妇女解放、女权主义、殖民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语境相当程度地意识形态化了,在意识形态化语境中,主体对于经典的认知与选择是一种话语行为,不同意识形态话语支配下所遴选的经典成为20世纪偏向意识形态化的经典,而不是偏向审美诗性意义上的经典,这就需要回到语境现场,考虑话语的偏向性问题,以阐释既有经典的经典性构成及其生成机制。不仅如此,传播接受塑造新诗经典的特征、规律,经典对传播接受反馈影响,对读者的改造,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培育等,都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的题中之义。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重构出认识新诗历史、估衡新诗价值的理论范式。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认为,新诗是传播接受中的新诗,传播接受是审视新诗历史、评估新诗价值最重要的维度。既有的新诗史叙述,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关于新诗历史的叙述,出现于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中^①,述史者基本上属于新文学阵营,他们以新文化观审视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历史叙述的重要目的在于为新文学建设和新诗创造提供民族历史依据与资源,新诗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被接纳与阐述;之后,一个世纪里,新诗逐渐从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体部分被叙述^②,它是新文化的体现,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构成对话关系,于是它的形象也就成为这种文化性对话的反映。在一些专门性的中国新诗史著作中^③,新诗自成体系,其形象更为独立,“新”是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中的形象标签。这样的新诗形象是被史家所叙述创造出来的,属于现代传播接受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化文化行为的产物,但是既有的关于新诗创作史、诗潮史的叙述,基本上不包括读者传播接受内容。事实上,新诗创作史、诗潮史与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讲,是新诗传播接受推进了新诗创作潮流的演变,没有传播接受史就没有创作史。例如,关于胡适初期白话新诗的争论,促使胡适进一步思考白话新诗的创作问题,围绕《尝试集》的论争^{[13][14]},坚定了胡适的某些新诗观,影响了新诗创作的历史走向;关于《蕙的风》的论争^{[15][16]},拓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推进了新诗现代性建设;关于《女神》的论争^{[17][18][19]},改变了郭沫若的自我认识、定位,影响了新诗创作的发展;围绕《志摩的诗》线装本的争论,影响了徐志摩的新诗观^{[20][21][22]},等等。中国新诗创作的演变,与读者的阅读批评、反馈分不开,而既有的新诗史叙述只叙诗人及其新诗创作内容,无视读者传播接受与反馈,推动新诗创作历史演变的具体事件被切割、删除,使得新诗史相当程度上成为新诗人及其作品的呈现史,而非真正的演变史。换言之,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将传播接受与新诗发展关系作为理论命题,在反思既有历史叙述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为重构新诗史提供了诗学理论资源。

① 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5年;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商务印书馆1924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赵祖朴《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光华书局1928年;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等等。

② 这方面的代表有: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等。

③ 如金钦俊《新诗三十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陆耀东《中国新诗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

与这一问题相关,新诗价值论也是传播接受诗学特别阐释的历史现象与理论问题。

新诗从20世纪初面世,就开始接受读者阅读批评,价值受到估衡。估衡要么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宏阔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以传统诗性、诗学质疑其创作方式与结果,盲视其新质;或以古诗为依据,肯定新诗人在古诗传统基础上的创造;要么是以域外诗歌为价值判断逻辑起点,从新诗与外国诗歌关系维度发掘新诗的现代价值,肯定新诗的艺术探索与创造,或者质疑新诗的民族性缺失特征;要么是以中国社会革命、中国文化新旧转型为历史视域,从新诗与中国社会发展、文化更新维度肯定新诗在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树,赋予新诗以社会革命价值、现代文化创造价值;或以诗自身创造为论说中心,质疑其非诗性表现;或只是在新诗创作内部,从诗人论、创作论层面分析新诗创作特征,肯定其诗性探索与经典创造的价值。凡此种种,从不同角度,发掘、阐述了新诗的诗性价值,一定意义上,对新诗作了有说服力的价值估衡。然而,既有评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无视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诗性创造以及文化建设的关系,未能引入传播接受项,使估衡所考虑的因素与内容存在严重的历史偏至,结论自然不可尽信。

事实上,所有文学艺术的价值都与传播接受有关,新诗发生发展于中国传播空间和传播方式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生成于现代文化、艺术的创造过程中,传播接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行为与其价值大小的关系更为密切。那么,从传播接受维度,具体应该如何梳理、判断新诗价值呢?一个新诗文本创作出来后,无论其是怎样一个作品,如果没有进入传播通道,或者进入传播通道而没有被读者接受,或者被读者一定程度地阅读理解而未能对读者产生正面的影响,或者对读者产生了正面影响而未能对社会发展、文化创造以及审美意识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这样的作品或者没有多大价值,或者说价值有限。质言之,只有那些被读者广泛接受,对文化建设、文学发展、诗性创造产生了正面影响的作品,对人格培养、社会秩序优化、文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诗作,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如果说文化建设、艺术创新、诗性创造,是衡量诗歌作品价值大小的内在依据与尺度;那么,作品传播与接受程度的大小则是衡量新诗人、新诗作品价值的另一重要依据。只有将二者接通,我们才可能全方位准确估衡一个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在以传播接受为依据评估一个新诗人及其作品价值的时候,应防止庸俗社会学倾向,合理地引入创作维度,将作品诗性与社会性、个人性与公共性、情感空间与思想价值、诗与史、诗与理等结合起来,以中国文化现代化、诗歌现代化为大视野,具体而深入地分析,有分寸地作出判断。

六、构建原则

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是研究新诗传播接受特征与规律的理论。关于新诗诗性生成、诗意创造、新诗艺术展开史、审美发展史等的探索,必须关注读者如何参与的事实,研究传播接受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是打通新诗内外部研究、史与诗研究的重要途径。那么,应如何构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

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既是一百余年来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生成出的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需要去发掘、叙述的历史事实,但它又不是对一种外在现象的客观记录与叙述,而是对历史现象背后的运行逻辑、理论特征的总结,历史性、理论性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不是一种固化的话语体系,而是由过去向未来延展的进行时态诗学,属于未完型的开放性诗学。何以如此?一方面,新诗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还处在生长期,新诗之“新”不只是区别于旧诗之“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而更是表动作的动词,即“更新”,就是说“新诗”属于进行时态,是不断更新发展的诗。所以,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所面对的创作现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需要处理的诗歌问题不断更新,其概念系统、理论构造因新诗的未完成性而处于不断更新之中;新诗生存其间的语境,也可谓是其传播接受时空场,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历史已进入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传媒的网络化、数字化特征使得新诗创作具有相应的网络智能性特征,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势必融入数字化语境问题,需要开放性研究新语境中的诗歌现象,提出新的诗学理论。

所以,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既是对新诗既有的传播接受历史特征的总结,属于新诗的历史诗学,

又是面向新诗最新发展现场的现场诗学与未来诗学。基于新诗创作百余年历史进程,倡导、建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诗歌理论,是这一诗学建构的重要特征。在研究、构建这一诗学体系时,应处理好几层重要关系。

一是历史诗学与进行时态诗学的关系。既要面对一百余年来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从历史现场发掘、概括新诗传播接受特征,揭示传播接受与新诗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为该诗学建立厚实的历史基础;与此同时,以新的传播接受形势,不断丰富与调整既有的诗学谱系,使之处于动态的生长之中,这是其活力所在。

二是沉淀与开放的关系。任何一种诗学理论,都是基于长期的历史沉淀,但新诗传播接受诗学还面临着向未来开放的现实,沉淀不是处于静止的时空之中,不是无目的的自然沉积,而是受到未来维度的制约,未来性决定了沉淀是有目的与意义的历史重建过程,沉淀中有关于未来的想象,这样的沉淀具有历史的开放性;开放基于历史事实,是传播接受经验的打开与再创造。这种打开与再创造,是以新的诗歌语境和读者为依据的,旨在延续与创造传统,赋予新诗发展以理论活力。

三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建构是一种主体行为,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势必受限于主体的全部知识与经验,受限于其理论创造能力,建构过程中必须时时警惕自我的有限性乃至狭隘性问题,尽可能克服主体自身不足对理论体系创造的影响。克服主体限度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也就是对过去历史的尊重,对当下处境的准确认识,对未来事实的想象与必要的警惕,在尊重客观事实的过程中,认清主体的有限性,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

四是传媒特性与诗性的关系。传播接受诗学不同于一般诗学的地方,就是对读者、接受者的重视,对传播媒介的重视,研究传媒与诗创造的关系。“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有何特征。”^[23](P41)媒介赋予其所传播的内容以某种特征,所以,我们一方面应发现传媒尤其是现代传媒赋予诗人、读者的关于诗歌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这是把握新诗与旧诗差异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应注意现代传媒作为现代科技的属性,它身上附着更多的科技性而非人文性,它拓展的空间更多属于社会性的而非诗意的。我们需要辨识传媒带给新诗的内容哪些是诗性的,哪些是非诗意的。构建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必须认真处理传媒性与诗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五是理论与问题的关系。作为基于历史事实而向未来敞开的诗学,不只是对于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的总结,其展开方式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其存在空间不是脱离现实的形而上世界,而是处于进行时态的新诗创作与传播接受现实,新诗发展问题是它面对的现实,处理问题是其重要的内容,或者说解决不断涌现的诗歌发展问题重于理论思辨,这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的重要特征,是建构该诗学体系必须具有的观念意识。

科学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是我们构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诗学体系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 [1] 王先霭.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李金发.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3] 朱光潜.谈晦涩.新诗,1937,(2).
- [4]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 [5] 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陈小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6] 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 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 [8] 胡适文集: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9] 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1926-05-13.
- [10]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1948,(12).

- [11] 胡适. 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 [12] 艾青全集: 第3卷.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
- [13] 胡先骕. 评尝试集. 学衡, 1922, (1).
- [14] 周作人. 《评尝试集》匡谬. 晨报副刊, 1922-02-04.
- [15] 胡梦华. 读了《蕙的风》以后. 时事新报·学灯, 1922-10-24.
- [16] 鲁迅.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晨报副刊, 1922-11-17.
- [17] 张资平. 致读《女神》者.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1922-04-11.
- [18] 郁达夫. 女神之生日. 时事新报·学灯, 1922-08-02.
- [19] 闻一多. 《女神》之时代精神. 创造周报, 1923, (4).
- [20] 尚钺. 昨夜独步. 京报副刊, 1925-09-28.
- [21] 周容. 志摩的诗. 晨报副刊, 1925-10-17.
- [22] 胡侯楚. 谈谈线装的新诗. 京报副刊, 1925-10-06.
- [23]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

On Constructing a Poetic System of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Fang Chang'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etic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 is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al laws, and poetic function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new poetr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new poetr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relevant discourses 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As a poetics, its theoretical system consists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oretical space and core concepts. The overarching concept, "the poetics of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founded on four essential root concepts of China, modern poetry,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and poetics, which determin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theoretical space includes the genealogies of concepts regard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new poetr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semination/reception and modern poetic creation, the formation of poetic imagery, and the evaluation of poetic value. At its core lies the mechanism of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This poetics fulfills four major theoretical functions: revealing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poetic creation, highlight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poetic theory, elucidat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 poetic imagery creation, and providing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requires careful balancing of multip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storical poetics and present-tense poetics, between historical sediment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etween subjective spirit and objective reality, between media characteristics and poetic creativity, and betwee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oetic practice.

Key words a poetic system; poetic theory; poetics of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theory of poetic value; modern Chinese poetry

■ 作者简介 方长安,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